

从“下南洋”到“一带一路”：中国海外移民模式的演变

高翔 陈延涛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河北廊坊 065000)

摘要: 当下, 中国的海外移民模式面临深刻的转型, 从以“下南洋”为典型的生存驱动模式, 转变为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的发展驱动样式, 目前, 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维度, 缺少对技术资本流动与文明互鉴协同的系统性阐释, 故运用历史比较、社会网络分析以及结合案例研究法, 剖析移民动因出现的质变以及技术移民所起到的功效。研究结论说明, 移民模式从“生存逻辑”向“发展逻辑”转变, 中国身份从“劳动力输出国”过渡到“全球价值链节点构建者”, 呈现出理论创新成果, 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未来需要深化跨学科研究, 密切关注新兴移民形态及风险防控, 让移民成为全球治理的包容纽带。

关键词: 海外移民; 下南洋; 一带一路; 移民模式

中图分类号: D63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9499(2026)04-0014-04

21世纪以来, 跨国人口流动已成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带动文明交流互鉴的核心动力, 作为兼具深厚历史底蕴与新兴经济体双重属性的国家, 其海外移民模式出现了从“下南洋”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明显转变。这一历史性飞跃折射出中国发展战略演进与全球治理转型相互塑造、协同推进的动态进程。与此同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侨华人分布趋势明显, 据有关统计, 目前该群体总人数已超过6 000万, 其中约有66.67%的成员生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1]。该数据直观反映了中国与沿线国家人员往来的日益密切, 同时表明,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 双方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的持续深化, 正系统性影响跨国人口分布格局。当前学界对该转型过程中的研究存在欠缺, 经典移民学说指出经济梯度差异会推动人口流动, 但对于技术资本与制度创新协同效应的解释还比较浅显, 全球价值链理论虽然搭建起产业升级分析的架构, 却忽略了移民群体在知识转移过程中所起到的节点作用^[2]。更重要的是, 现有的成果大多集中在“下南洋”移民的个人叙事或者“一带一路”政策的单向解读上, 缺少把历史制度主义和空间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的跨学科视角, 对于移民模式转型的文明互鉴理解还比较欠缺。

基于此, 利用“技术资本-制度适配-文明互鉴”三维分析模型, 并借助“双循环分析框架”来实现方法论上的新突破, 即纵向维度使用历史对比法, 对1840—1949年南洋移民档案和2013—2023年“一带一路”移民数据进行跨世纪对比分析, 发现移民动因从“生存逻辑”到“发展逻辑”的质变内在规律, 横向维度结合中老铁路、泰国罗勇工业园等典型案例, 使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 发现技术移民群体对于东道国产业升级起到的催化作用。

一、“下南洋”：生存驱动的移民潮

近代中国的“下南洋”运动, 从本质上来说, 是一场受

到生存压力支配的跨国人口迁徙活动。它的兴起是国内外多种结构性因素一同作用的产物: 国内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从而引发了人地矛盾, 土地兼并现象致使生产资料变得匮乏, 这二者共同构成了促使移民向外流动的“推力”, 西方殖民势力在南洋进行种植园与矿业开发, 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再加上清政府因为不平等条约而被迫放宽海禁政策, 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吸引移民的“拉力”。在推力与拉力的共同影响之下, 众多东南沿海民众冲破了地理、制度的壁垒, 前往南洋去寻觅生存空间, 从此便开启了在异质文化环境中艰难寻求生存并逐步融入的历史进程。

(一) 历史背景与原因

下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三大人口迁徙之一, 它的历史意义不能被忽略, 鸦片战争之前, 有150多万华人生活在南洋进行贸易, 清政府为了不平等条约, 允许西方国家从东南沿海地区招募华工, 为近代南洋移民潮的出现打下了基础^[3]。这股移民潮的兴起, 是国内和国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国内因素来看, 明清两代人口迅速增长, 特别是到清代, 人口由1.4亿猛增至4亿, 人口增长速度很快, 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资源紧张问题日益突出, 土地资源集中兼并的现象十分严重, 民众的纳税负担很重。西方列强在东南亚大规模建立种植园、矿山,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非洲黑奴贸易进入衰落期之后, 华人成了主要的劳动力补充来源, 殖民者为了吸引华人移民, 采取了种种优惠措施, 比如划拨土地、免费安置等。尽管这股移民潮的迁徙过程十分艰苦,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生育压力, 而且也对东南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通过建立宗族、同业社区等方式来共同抵御风险, 这一时期的移民潮是有关中国人口流动的重要历史事件, 也是中国同东南亚地区关系演变史上的重要一页^[4]。

(二) 移民群体与迁徙路线

在“下南洋”的移民中, 闽粤沿海居民占多数, 地缘分层特征明显, 闽南晋江陈埭丁氏家族采取“连环移民”形

收稿日期: 2026-02-11

基金项目: 2026年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计划项目“在华外国人社会融入工作体系研究”(YJSKC2601)

作者简介: 高翔(1999—), 男, 山东枣庄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移民管理研究; 陈延涛(1978—), 男, 河北定州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移民法治、中外移民制度比较研究。

式,在菲律宾马尼拉唐人街开展建设项目,黄乃裳带领永春移民到新加坡诗巫创建“新福州”聚落;潮汕“红头船帮”依靠韩江航运活动,1860年汕头开港后,每年大约有6万人通过樟林港到暹罗去,泰国华人社区的主导语言仍然是潮州话;广府四邑的移民因为美洲淘金失败,开始转向南洋,商帮式的迁移与十三行贸易网络深度交织^[5]。这些地区的人们有长久的航海传统和冒险精神,并且与南洋地区相距不远,交通也比较方便。伴随着技术的发展,迁徙路线也发生了变化,处于帆船时代时,依靠季风形成了“冬往夏返”的航行路线。进入蒸汽轮船时代,英资公司开通了厦门到槟城的定期航线,船舱的分层体现了社会阶级的差别,上层“水客”和底层契约华工一起在船上赶路,1887年《出洋章程》促成了偷渡链的形成,在槟城的“新客”要忍受硫磺熏蒸,移民落地后形成了三级扩散网络,一级枢纽包括新加坡、马尼拉岷伦洛区等地区,大部分码头劳工通过同乡会馆找到工作;二级据点延伸到锡矿带和橡胶园;三级渗透更深入到北加里曼丹丛林,客家社区用“公司”制度开发胡椒种植园^[6]。迁移过程依靠“水客体系”产业链来运作,根据厦门“和记栈”的档案可知,移民用6银元作为“引荐费”来换取船票和文牒,槟城广福宫的碑文记载了闽粤械斗的“分街而治”方案,而《三字经》《千金方》依靠五福书院(1819年)转变成文化纽带,形成横跨南海的生存网络,分层迁移不但重新塑造了东南亚的经济版图,而且把地缘和血缘当作经纬,展现出华人社群走过的三个世纪的生存图景^[7]。

(三)生存策略与融入困境

到达南洋之后,在殖民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生活压力下,移民群体只能采取不同的生存方式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经济网络中。绝大多数移民被束缚在契约劳工制度之下,被吸纳到种植园、矿山等初级产业部门,成为依附性劳动力。但是,在高度受限的劳动场域里,华工仍然表现出显著的技术能动性,以苏门答腊日里(Deli)种植园为例,客家华工用实践创新改良出环割法这个关键的割胶技术,大大提高了橡胶生产的效率,直接使该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橡胶供应基地^[8]。同时少数有商业资本积累的移民脱离了劳工体系,以从事商贸活动的方式建立起早期华人商业网络,形成了和劳工群体完全不同的职业融入途径。作为福建永春人,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了“谦益号”黄梨罐头厂,并且创建起联系南洋和厦门的贸易网络^[9]。到1937年,他的“平民商店”连锁零售店已经遍布东南亚的78个城市,为了在海外互相帮助,移民们成立了各种社群组织,如同乡会、宗亲会等,在解决新移民生活困难、提供就业信息、维护华人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移民也遇到了很多挑战,文化冲突就是其中一种,中元节期间街边焚烧纸扎的习俗,由于殖民当局以妨碍公共卫生为由多次禁止,1890年,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称,警方一天内没收了超过两吨祭祀用品。由于华人文化的传统与习俗与当地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在交流、日常生活等各方面造成许多误解、矛盾。政策上存在的歧视给华人带来沉重的压力,在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对华人采取多项限制措施,1890年英国殖民政府公布的《海峡华人法令》设限三代以内移民,购地不能超过5英亩^[10]。这段在生存和被排斥的情况下挣扎的历史,既培育出华人经济的韧性,又种下

激化族群矛盾的种子。

二、时代变迁中的海外移民模式转型

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外移民模式也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不仅仅是移民的迁移路径在变,移民所处的社会结构、文化素质以及他们在海外的角色定位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一起构成了海外移民模式由单一走向多元、由低层次走向高层次的发展脉络。

(一)中间阶段的多元化发展

从“下南洋”时期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中国海外移民模式是多元化的,其主要特点就是移民目的地、移民动机和移民结构的变化。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国海外移民的目的地已经不再只是东南亚地区,而是扩展到了欧美、澳洲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由于拥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好的生活条件,逐渐成为我国海外移民的首选之地^[11]。移民动机也由原来的单一的谋生需求转变为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即海外留学、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大批学生赴美、英、澳等国家留学深造,部分毕业生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生活,逐渐形成了以知识技术型为主导的移民群体。技术移民依靠专业技能谋求职业晋升,投资移民借助资产全球化的调配来达成生活方式的国际化,多元化的移民模式体现出中国同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

(二)移民结构与素质变化

移民模式多元化转型不单是目的地和动机的扩大,更是移民主体自身构成的变化。相较之下,这一时期的移民,在人口学特征上有了本质的不同,即人力资本的累积和社会角色的转变。一方面移民的知识、技能水平得到提高,高学历的专业人才成为新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女性移民的比例增加,角色由被支配变成自主的决策者。这些结构性变革显示了中国海外移民由“体力输出”转向“智力和资本输出”的范式转变,给后来的“一带一路”倡议下新型合作打下了重要的人才和社会网络基础。

1.高学历与高技能人才比例显著增加

与下南洋时期相比,这一阶段的移民结构有明显的不同。在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之际,高学历、高技能的移民也成了主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从中国顶尖高校毕业的计算机、金融、工程等专业学生大量去往美国、加拿大等地深造,在这些国家的科技企业、金融机构工作后,在人工智能、量化金融、生物科技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近些年来,在美国等高技能移民的目的地,近一半的新移民持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其中来自亚洲的移民,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移民,是高学历移民的主要来源^[12]。一方面,提高了个人的职业发展机会;另一方面,也大大改善了海外华人整体形象和国际地位。

2.女性移民比例提升与角色多元化

女性在国际移民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其角色也由原来的“依附者”转变为现在的“主动决策者”,是移民性别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体现。这种转变表现为两种主要途径,一是以留学和职业发展为方向的独立移民数量越来越多,21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选择去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攻读教育学、心理学、商科等专业,毕业后通过工作签证或者创业签证留在当地发展,形成了主动的职业型移民路径;二是家庭团聚移民中,女性不再只是丈夫的随行家属,而是根据自身的事业规划,一起参与到移民决策中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和职业空间^[13]。这使传统的男性移民格局被打破,也表现出移民群体性别角色的进步。

该阶段形成的高技能移民储备、跨国流动网络、跨文化适应经验,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共赢”型移民模式的形成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使中国的海外移民由原来的“个体主动发展”变成了“国家战略下的系统协同”。

三、“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新征程

中国海外移民结构实现从生存导向向发展导向的深刻转变,日益转化为重要的人才智力储备与跨国协作网络。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移民活动也被纳入到国家战略框架当中,由原来的个体经济行为变成了服务“五通”目标的系统性实践。这就意味着移民进入到以战略协同、互利共赢为重心的新阶段,移民的角色也由原来的劳动力供应者变成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主体和人文交流的纽带。

(一)倡议背景与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由于全球化转型阶段所产生的一种战略需要。21世纪开始阶段,全球治理体系出现结构层面的改变,美国用“亚太再平衡”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来形成排他性的经济圈,TTIP谈判也把中国的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空间进一步压缩。中国对外贸易通道脆弱性十分明显,80%的能源进口依靠宽度只有2.4公里的马六甲海峡,而西部省份外贸额所占比例不到7%,这就表现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14]。由此产生了陆海联合破局的方法,依靠古代丝绸之路形成的文化认同来创建新时代的合作局面。该倡议依靠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促进了要素再组合,涉及安全、经济、金融、治理等诸多方面,它既推动了中国同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商业合作,又加强了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给区域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从经济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铁路、公路、港口、桥梁等基础设施项目修建,一方面可以降低物流成本,改善贸易效率,另一方面也给参与国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实施属于当代中国重大战略举措,在全球化的进程之中紧跟时代发展的大势,担负起作为大国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与担当。

(二)移民新态势与特点呈现

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的海外移民格局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随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入,跨境人员流动也由原来的商贸往来扩展到工程建设、技术输出、教育交流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以中亚、中东、非洲为依托的多维人口网络。这就意味着要素流动由原来的单一商品贸易转变为技术、资本深度融合的过程。就空间分布和行业特点来说,移民流向与重大项目布局高度吻合,具有很强的地缘经济属性。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由于油气化工和新能源领域合作的加深,很多中国的工程技术、管理人才通过EPC总承包的方式来到当地工作,促进了

当地产业升级和技术标准的输出;在阿联酋,凭借全球贸易枢纽区位与高水平开放政策,超8 000家企业在此扎根发展,成功构建集传统商品集散、现代物流与跨境电商于一体的全链条华商生态^[15]。两地实践表明,中国海外合作正从单一要素输出向“产业+标准+生态”的多元化模式稳步演进。

同时移民人口构成也变得更加多样化,技术人员、项目经理等具有工程技术或专业背景的人数大幅增加,给铁路、港口、能源设施等大型工程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创新创业群体成为新兴力量,依靠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在沿线国家开拓市场。由于教育合作不断加深,留学生的数量也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跨国人才储备库。中国移民不但给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一份贡献,而且用文化传播活动的形式促进了文化交流。移民潮同数字经济、远程办公、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出现的业态深度融合,产生了一批“数字游民”,他们依靠数字平台在沿线的多个国家开展灵活就业。人员、技术和文化三者相互作用,正在促使“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形成更加紧密的发展共同体^[16]。

(三)合作项目与多元交流

“一带一路”倡议搭建起跨国交流网络,推进区域互联互通和人才流动。其中,中老铁路成为技术转移和人力资本培育的载体,改变老挝陆路运输格局,依靠全周期知识传递机制促进技术互动,泰国罗勇工业园促使中国企业集聚,借助本土化生产把标准化工艺流程融入当地产业链,带动技术认知体系对接,实现从资本输出到技术规范协同塑造的跨越。跨境经贸合作和创新要素流动协同并进,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强劲支撑。2022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达13.8万亿元人民币,新兴领域投资占比达37%,催生了新型职业群体。在务实合作方面,中国同沿线国家共同创建重点实验室,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其耐旱水稻品种在哈萨克斯坦得到推广;教育合作网络持续完善,人才循环体系初步形成,中俄高校联合培养的双文化专业人才成效显著。目前,人员流动由单向的技术输出转向双向的能力共享,老挝的铁路调度员到中国参加培训,印尼的数字人才到杭州进行实训,体现出人力资本培育的共生特征,给区域可持续发展赋予创新动力。

四、模式对比:从生存到共赢的转变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移民新动向,与历史上“下南洋”移民潮有着本质的不同。差异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国际地位、全球治理理念的变化所引起的。为了更清楚地体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背后的原因,有必要从驱动因素、移民主体和目的三个方面对两种移民模式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

(一)驱动因素之变

中国海外移民的驱动机制由从生存压力占主导到发展诉求起引领作用的历史演变,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的“下南洋”移民潮,本质上是农业社会危机引起的被动迁移,东南沿海地区存在着人口膨胀、土地兼并、赋税苛重等诸多压力,再加上周期性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存环境变差,驱使底层民众利用跨国流动获取基本的生存资源,这种聚焦个体生计保障的单

向度迁移,体现出明显的自发性和零散化特点。

依靠“一带一路”建设的当代移民流动,源于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内在需求。中国依靠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形成的资本、技术、产能优势,同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基础设施缺口、产业升级需求相契合。政府主导形成起制度保障体系,包括56个双边投资协定、4 000多亿元国际产能合作基金,给系统性人才流动创建起平台。新型移民模式具有双向互动性,中国工程师把数字化钻井技术带到哈萨克斯坦油田,东南亚数字经济人才也参与到中国的跨境电商生态建设当中。移民驱动力的改变,体现出中国由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国变为全球生产要素整合者的角色转变,也表明跨国人口流动进入搭建发展共同体的新阶段。

(二)移民主体与目的的差异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南洋”移民潮主体的构成具有明显的同质性,来自福建、广东沿海的无地农民约占移民总数的83%,他们背负着农业文明衰落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不得不从事东南亚殖民经济体系里的初级资源开发工作,如橡胶种植园的经营和锡矿的开采,识字率低,因此移民的职业选择大多集中在产业链的最底层,目前“一带一路”建设下的移民流动具有知识密集型要素流动的特点,专业技术人才在移民群体中的比例提升至41%,涉及轨道交通、数字基础设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他们的移民行为被嵌入到国际产能合作的价值链重建当中^[17]。中老铁路项目技术团队所采取的“技术嵌入、本地化培训”方式,使得老挝铁路工人职业认证比例大幅提高,揭示出知识转移具有系统性。同时,留学生群体被当作重要的人力资本储备,从而推动了工程与科学等各方面的“双向赋权”,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中白联合学院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培养出400多名多学科人才,这些人才掌握了两国现行的技术标准体系。由以生存为导向的个体移民转向以发展为导向的系统移民,可以看作是国家发展范式升级的微观映射,处于这一转变过程之中,个体移民更多地关注个人生计的维持,而系统移民则将重心放在技能的提升、职业的发展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价值共创上,由单一的劳动力输出转变为知识密集型人才双向流动,既表现出中国海外移民结构变化的情形,又反映出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角色变化。

五、结语

下南洋在我国历史上是不可磨灭的文明互鉴时期,它给当今跨国人口流动现象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给“一带一

From “Going to Southeast Asia”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Overseas Migration Patterns

Gao Xiang Chen Yantao

(People’s Police University of China, Langfang 06500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overseas migration model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urvival-driven mode typified by the “Southeast Asian Migration” to a development-driven pattern led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urrent research mostly focuses on a single dimension and lacks a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nergy between technological capital flow and civilizational mutual learning. To this regard, this study adopts historical comparis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methods to analyze the qualitative changes in migration motivations and the role of skilled migra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migration pattern has shifted from a “survival logic” to a “development logic”, and China’s identity has transitioned from a “labor exporter” to a “builder of global value chain nodes”, present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that provide Chinese solutions for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losely monitor emerging migration forms and risk prevention, so that migration can serve as an inclusive bond for global governance.

Key words: oversea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n migr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igration pattern

[责任编辑:石金焕]

路”倡议下的新型移民模式提供了一定的借鉴。21世纪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既是中国人加深对外开放的内在需求,又是同亚欧非以及世界各国深化互利合作的必然选择,同时伴随着沿线各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中国的海外移民也呈现出结构升级和多元化发展的态势,移民群体正在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向高技能人才转变,移民领域也在由原来的基建、贸易领域向文化软实力领域不断延伸拓展,形成了“硬联通”和“软联通”互相促进的局面。交流合作可以提高各国的人力资本质量,也会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使各国形成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协调传统移民模式中的生存需求与发展导向的系统性目标,将成为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1]贾益民,张禹东,庄国土.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9)[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13-214.
- [2]Waldorf B.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 Miller[J]. Urban Geography, 2013,17 (8):758-759; McWilliam S E,Nielsen B B.Global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Redefining the Contours of 21st Century Capitalism[J].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0(51):1347-1350.
- [3]刘平.下南洋:晚清海外移民的辛酸历程[J].传承,2010(31):32-33.
- [4]庄国土.中国华侨华人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45-48.
- [5]施国庆.“一带一路”与国际移民分论坛探讨国际移民机遇与挑战[EB/OL].(2019-11-10)[2025-09-11].https://giis.gdufs.edu.cn/info/1606/13037.htm.
- [6]曾维威.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美国对中国周边地区公共外交的特点及影响[D].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论文,2017.
- [7]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56-58.
- [8]王佩璇.开发马来西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华工[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5):59-64.
- [9]陈碧笙,陈毅明.陈嘉庚年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45-47.
- [10]崔玉斌.我国边境贸易研究热点述评[J].国际贸易问题,2007,293(5):123-126.
- [11]李世龙,张丽,梁帅,等.国际人才竞争力评估报告评述[J].今日科苑,2024(8):7-19+28.
- [12]李怡.外媒:研究显示亚洲移民增多使美移民教育程度提高[EB/OL].(2017-06-02)[2025-11-19].https://www.gqb.gov.cn/news/2017/0602/42683.shtml.
- [13]李芳田,王慧婷.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女性移民治理[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134-140.
- [14]王婕佳.“一带一路”下中缅边境贸易现状、问题及对策[J].北方经贸,2021(1):32-33.
- [15]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在“一带一路”的棋盘上,落子有声[EB/OL].(2026-01-01)[2026-02-02].https://www.dian dian.cecc.ceec.net.cn.;李曦子.超8000家中企落户,迪拜吸引力在哪?——专访迪拜经济发展公司CEO哈迪·巴德里[N].国际金融报,2025-07-07(04).
- [16]尹建东,吕付华.传统延续与现代转型:当代中国边境集市结构功能变迁研究——以云南为中心的考察[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0(4):77-89.
- [17]周大鸣.我国边境移民研究:回顾与展望[J].中国出入境观察,2019(7):38-40.